

《道教研究論集》，柏夷著，孫奇、田禾、謝一峰、林欣儀譯，秦國帥、魏美英、紀贊、謝世維校。上海：中西書局，2015。283頁。人民幣55元。

《道教研究論集》是美國學者柏夷 (Stephen Bokenkamp) 的道教論文集的中譯本，本書的出版是「國際佛教與中國宗教」研究叢書計劃成果之一。該計劃旨在翻譯域外佛教以及中國宗教的研究成果，促進中外學者之間相互了解與交流。在翻譯上，大膽啟用專業領域內的年輕學人，為新生代的學術帶來了一股春風。

作為美國著名的道教研究學者，柏夷的學術成就及影響，想必不用多論。最近北京大學王宗昱教授《國際道教的問題與視野——評美國學者柏夷〈道教研究論集〉》一文已詳述了柏夷教授的學術成就。因此，本文僅就這本書的研究內容與翻譯做一些粗淺的評論。

本書選譯的14篇文章，均是柏夷的代表性作品。雖然這些文章有不少發表於二十年前甚至更早，有些問題也早已不能代表當今研究的最新成果，但作者研究問題的視角與方法、敏銳的問題意識則極具啟發性。因此，中譯本為我們再一次閱讀柏夷的經典作品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本書的內容，包含靈寶經研究，以及由之展開的佛道關係研究；關於道教研究方法論的討論，一方面反駁舊氏研究的誤區，另一方面為今後道教研究的方向與方法做了具有啟發性的展示。

## 一、靈寶經研究與佛道關係

眾所周知，柏夷先生關於佛道關係的研究是繼許理和之後的又一典範。他在〈蠶與菩提樹：靈寶派取代佛教的嘗試以及我們定位靈寶道教的嘗試〉一文中，以道教靈寶派為視角，探討佛教與道教的關係。作者認為，由於傳統宗教研究尋找「純正起源」的方法論範式，導致「混合即玷污」的思考模式一直影響著現代學者。具體到靈寶派中所反映的道教對於佛教的調和，很多學者都傾向於用「佛教影響道教」的思維模式，尋找靈寶派經典中被借用的佛教元素。但這種研究的方法，是一種歷史的想像，也不符合中古中國的文化特色。

作者認為，靈寶派道教對於佛教的調和恰恰是意圖取代佛教的嘗試。順著這種思考路徑，作者再次對古靈寶經中所謂的「新」、「舊」兩組經典進行重新解釋，認為對於兩組經典的分析不能僅著眼於「裂縫」與「接口」，同樣要考察陸修靜及其同時代的人之所以把兩類獨特的經典歸於一類的原因。首先，作者認為靈寶經的作者企圖要超越此前的知識，把更早的材料通過切割與黏貼的辦法重新改寫，形成靈寶經。因此不應該把因剪切與黏貼造成的「裂縫」歸因於不同的道士團體。其次，所謂兩組經典不同的出世神話，歸根結底都降示給了葛玄，而且其差別並非基於文本如何被解讀。因此作者認為，強調差別會誤解靈寶經作者的本意。最後作者利用靈寶經與北朝佛教碑銘中「願」，展示道教在改造佛教的同時，使佛教進一步本土化並弘揚佛教的過程。

針對靈寶經融攝並改造佛教內容的動機與過程，作者進一步利用石刻資料再次予以論證。利用姚伯多造像碑的銘文與《靈寶經》作比較，認為銘文反映了北方民眾在五、六世紀對靈寶經的接受情況。靈寶經中對佛教的包融，可以看成是造像碑成立的理論基礎。以往被認為是大眾的邊緣的宗教形態，可能是新的道教流派——靈寶派的影響。不拘泥於佛道二教的造型碑，反映了靈寶經獨特的「道—佛主義」。這對認為散落於民間的雜糅佛、道、民間神靈的碑刻，反映的是邊緣的、世俗的宗教形態這一觀點進行了有力的反駁。對我們理解靈寶經中「佛—道」策略啟發性極大。但作者也認為，造像碑的作者並沒有全面接受靈寶經，也可能是「道教內部彼此融攝的衝動」，因此雖然作者提醒，要防止文獻所代表的正統道教所設下的陷阱，但自己卻掉進了《靈寶經》的陷阱之中。造像碑所反映的內容可能並非靈寶經所能涵蓋，它只是歷史上真實的宗教形態而已。

柏夷先生擺脫單純的「佛教影響道教」的研究模式，倡導利用複合體系研究靈寶道教內在的邏輯性，對靈寶經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啟發意義。近些年的研究進展也證實了這種方法的可靠性。同時其意識到古靈寶經統一性研究的重要意義。但從近些年劉屹、王承文等諸位先生對相關問題的研究來看，兩組經典差異性的研究還是很有必要。因此，在其強調統一性的同時，卻模糊了兩組經典的差異性，似乎有迴避問題的嫌疑。

在強調擺脫佛道關係研究中「影響」、「借用」等術語使用的同時，作者嘗試用更為有效的方式來闡述這一交涉過程。作者以「須達拿本生故事」為例，以三個佛教譯本與一個道教改寫本為切入點，研究同一個故事如何與時空相適應，並對單純的從佛教與道教的分界來解釋故事差異的方法提出了質疑。其敏銳的發現所謂不同的故事版本是在一種「聽眾與作者之間互動因應」的過程中形成。須達拿本生故事的不同版本體現了作者針對中國聽眾圍繞「情感校準」與「家庭協商」等文化背景上所做的調整與刪改。

其實，所謂的「情感校準」、「家庭協商」，可能都是佛教本土化的一個過程。在〈成仙之階：道經中「地」的概念〉一文中，作者以佛教與道教「地」的系統為例，解釋了道教「地」的系統是基於中國傳統觀念，對佛教「地」的系統的改造。同時透過改造的過程，理解中國人對佛教信仰的態度。道教雖然借用了佛教的內容與概念，但會在修改後，證明自己的版本比佛教的版本更加符合中國的情況，佛教則是在本土化的過程中推動了其自身的發展。

最後，作者又討論了靈寶經與道教寺院主義的問題。以靈寶經運動中產生的「法師」一職為切入點，論述法師在授度儀式、形象外觀表現、儀式活動場所以及行為規範職責方面，不同於以往天師道，並力圖替代天師道、重新建構一個獨立的道教組織的嘗試。作者敏銳的觀察到早期靈寶經雖然強調山居、出家修行，但並不是導致道士住觀的主要原因。因此作者反對過於強調佛教對靈寶實踐的影響。同時通過靈寶經中對法師角色塑造過程的論述，證明所謂的「元始」與「仙公」兩系經典即靈寶神話與實踐相結合的結果，再次強調兩組經典的一致性。

## 二、道教研究的方法論

柏夷先生是一位非常重視方法論的學者，雖然上述幾篇文章都是在討論靈寶經以及佛道關係的問題，但其中也包含了豐富的方法論意義。作者強調不能簡單地用「佛教影響道教」或「道教借用佛教」的論述模式研究佛道關係，而是要探索在時空背景下，影響過程發生的動因及其結果。

### (a) 尋找事件背後的內在動因

不滿足於描述一個事件的過程，從過程中找到其發展的動因，使得柏夷先生的研究具有很深刻的意義。他在〈道教神系〉一文中，考察了道教神靈不像世俗官僚制度那樣會受到規則限定，而是顯得怪異、樸素。《真靈位業圖》所呈現出來的整齊有序的神系，也並非陶弘景所刻意構建。道教神系也沒有從此變得規整，直到唐初道教學者在國家主導下開始了神系標準化的過程，這期間神系極為流動且不穩定。這種情況，與道教開放的、兼容的宇宙觀有關。因此，如同理解佛道關係，不能簡單地用「影響」一詞來概括一樣，重要的並不是道教神系為何，而是神系何以如此，以及應該嘗試著理解，不一致的神系背後被創造出來的目的。如意圖涵蓋與之競爭的宇宙論，修行者根據自己的需要利用多種權威資源，抑或是對不可知世界靈活開放的態度等。

在〈屢現的預言：道教末世論和唐王朝的建立〉一文中，作者介紹了道教的末世論理論，描述了隋唐以前道教末世思想在社會上的流行。分析《大唐創業起居注》中的《太原詩歌》之所以蘊含道教末世思想內容，是李淵在努力地尋求滿足並順應當時社會中為天啟期盼困擾、渴望聖君降臨的需求。

對李白死於黃山煉丹問題的考證，則更加鮮明地反映作者探索事件背後動機的熱情。作者要研究李白寫作黃山詩歌的動機與意義，認為黃山作為黃帝煉丹成就的地方，是吸引李白選擇黃山作為自己歸隱之地的原因。而其寫作的十幾首關於黃山的詩文，反映其對煉丹的狂熱。從李白用寫作詩歌的方式，大張旗鼓地宣傳煉丹活動可知，其晚年在黃山煉丹，並死於服丹的可能性很大。

### (b) 對文獻的批判

作者對道教研究中文獻批判，也有很具啟發意義的探索。如其在〈何為道之體？〉一文中，質疑道教人體學是中國思想史的異類的看法。認為道教身體觀在它的時代乃至中國古代思想世界具有連續性。道教身體觀的「多重精神」的身體隱喻，用來描述身心衰敗的過程。而使用這種隱喻的中國思想家們並不僅僅存在於道教學者之中，佛教文

獻中同樣可以找到為了追求宗教目標而描繪的多重精神身體的情況。因此，作者為今後的道教研究提供了一條新路，即把道教文獻與同時代的其他文獻進行對話，研究中國古代思想家的身體隱喻系統，進而探討他們如何理解自己。

另一篇〈桃花源與洞天〉中，作者比較了《道藏》中遊歷洞天的故事，與陶淵明〈桃花源記〉之間的關聯性，從而引出處理文獻所面臨的困難。即如何從不同的闡釋中將一個故事獨立出來。作者提出不能心存對所謂作品「文雅」或「不雅」的偏見，要盡可能利用各種不同性質的文獻作為參考標準，找到各種文獻作者改寫故事的立場，最終把真實的故事獨立出來。

論文中收錄的唯一的一篇書評，也可看做是柏夷先生關於文獻批判方法的論述。其認為高德耀的鬥雞研究，並非旨在解釋說明鬥雞的知識，而是透過鬥雞，研究其中的社會文化現象，以鬥雞為切入點關注其所涉及到的社會的方方面面。正如好的書評，並不會在書籍所限定的範圍內去檢驗所要評論的書籍，而是透過這本書去建構一個現象層面，並感知其意義。因此，對於文獻的選擇，需要防止就事論事。從一點出發，首先建構大的文獻層面，形成現象層面，從而使得研究變得更加深刻、有意義。

### (c) 漢語文化語境的重要性

柏夷先生早期從事中國文學的研究，因此使得他比其他西方道教學者可能更加注重漢語的語境。〈再看中國的隱喻：閱讀與理解——中國詩學傳統中的比喻〉一文，作者反駁了余寶琳認為中國詩學沒有隱喻，只有比喻的觀點。論證中國傳統詩學中不僅存在「以類相從」的比喻，也有抽象的「隱喻」。其從大量的實例證明，中國的隱喻不只是「物質的」，還包含豐富的形而上的內容。只有了解這種文化語境，才能體會到漢語詩學中的「隱喻」。因此，在他看來，那些認為漢語中的比喻以神秘的、不合邏輯的方式而展開的結論，完全脫離了漢語的文化環境。

最後在研究「塗炭齋」的一篇文章中，作者再一次為我們展示了熟悉漢語文化語境的重要性。他梳理了西方學者對「塗炭齋」儀式內容與意義的論述，並證明了這種論述的錯誤所在。一方面來源於對中國傳

統文化語境的陌生。如中國傳統中，「自謙性」語言是一種禮貌性的語言，也是一種儀式性的語言，並不能被理解成是真正的自貶。儀式過程中的懺悔，其實也不是個人的經驗，而是儀式要求，以便應用到每個個人。另一方面則是把西方文化語境帶到了中國道教的研究中，如把塗炭齋比附基督教的聖灰節，把聖灰節的儀式內容與意義比附到了塗炭齋之上，因此造成研究上的訛誤。

總之，這些研究方法都具有很好的啟發性，不僅為研究道教提供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研究理路，同時還提醒我們研究過程中可能遇到的一些陷阱。因此，這些文章的意義已經不局限在其最後的結論上，而是其研究問題的角度與方法。

### 三、值得進一步探討的部分

南北朝時期，道經曾大規模的模仿佛經，甚至直接抄襲佛經的內容。在作者看來，隨著佛道論爭的深入，道教徒為了避免來自佛教徒的攻擊，便開始對那些明顯複製佛經的道經進行刪除與修改，大淵忍爾先生就發現隋代《靈寶經》寫本中存在有佛教術語，在七、八世紀的寫本中被改寫成了道教術語。柏夷先生圍繞這個論點，進行了很多的闡述。然而，晚唐杜光庭《道教靈驗記》卻有僧法成改寫道經為佛經，「改天尊為佛，言真人為菩薩、羅漢」，僧行端改寫道經《五廚經》為《三停廚經》的記載。可見，刪改道經並非只有道教徒，刪改原因可能也非常複雜，應該不僅僅只是佛道之間的論爭而已，如要理清前因後果，可能還需要做進一步的研究。

### 四、翻譯中的一些問題

#### (a) 引文的翻譯方面

本書作者在引用道經或佛經時，均是把漢文引文翻譯成英文後引用。因此，本書的譯者再把這些引文翻譯成漢語時，應盡量依據作者的英文翻譯倒翻過來，而不是直接抄回原典。因為很多道經、佛經艱澀難懂，原作者的英文翻譯，本身就是研究成果，也反映其對引文的理

解。如果這部分不翻譯則不能充分體現文章的價值。而且直接抄回原典，也存在偷工減料之嫌。以〈佛教須達拏太子本生故事與其道教版本〉一文為例，譯者既有翻譯英文引文的情況，如第24–25頁的引文；也有抄回原典的情況，如第23、28、29等頁的引文；甚至還有翻譯引文、抄原典混雜的情況，如第27頁引文。因此，譯文對引文的處理，顯得前後不一。特別是混雜的翻譯，使得引文內容半文半白，有些不倫不類的感覺。

類似情況在〈屢現的預言：道教末世論和唐王朝的建立〉也有出現。作者引用的《太原詩歌》是極為難懂的詩句，因此原作者一方面引了漢文詩歌，一方面又用英文作翻譯。可惜的是，本書譯者則把英文翻譯忽略了。諸如此類情況還有，此不列舉。

### (b) 個別語句翻譯繁冗，以致譯文模糊難懂

如〈桃花源與洞天〉一文，「某則特定故事未說明任何文字資料來源這樣的事實，並非一定意味著文字資料並不存在」（頁171），這裏「這樣的事實」譯自「the fact」，其實可以不用翻譯。「並非」與「並不」前後重複，「文字資料」也前後出現兩次。因此如果翻譯成「某則特定故事未說明文字資料來源，並不意味著其不存在」，文意就顯得明白易懂。

又如「無論這位神靈幻化為人，將其經文藏於口袋中，抑或用微妙的方式予以神啟，都無關緊要。」（頁172）這裏「無論」位置調整一下，句意就變得易懂：「這位神靈幻化為人，無論將其經文藏於口袋中，抑或用微妙的方式予以神啟，都無關緊要。」

當然這些都是一些非常小的問題，並不能掩蓋整本譯著的價值。同時，也期待今後可以有更多的諸如此類的譯著能夠面世，以便更好的造福學林。

張鵬

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